

东北师范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政策的探析

---

姓名：纪国华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世界史

---

指导教师：张晓华

---

20080501

## 摘 要

在俄国历史上，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俄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发展道路，对俄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改革中，彼得大帝在宗教领域的变革引人注目。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改革措施，彼得大帝把教会完全纳入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此，俄国的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设定的关系当中，一个明显而又重要的事实就是，俄罗斯正教会的社会地位由此下降。基于对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宗教政策的实施状况以及宗教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的多重考虑，笔者展开全文的论述。根据行文的需要，笔者将论文的框架安排如下：

全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选题价值及论文要解决的问题。

正文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前彼得大帝时期与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的历史概况，即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政策制定的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着重论述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政策的内容与实施。

第三部分旨在阐述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政策对俄国中央集权制度、俄国俗产实力、俄国民族文化以及俄罗斯正教会的影响。

结论部分总结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改革的认识。

关键词：俄国；彼得大帝；宗教政策

## **Abstract**

The reform of Peter the Great ha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Russian history. The reform had obtained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and since then had drawn Russia toward a different path from before to its development, imposing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upon Russian history. Amongst such a reform, Peter's measures taken to the Russian Orthodoxy Church were noticeable. Through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Peter finally had caused the Church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Tsarist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is, the relations of Russian politics to the Church had been included in a rebuilt framework of relations, of which a notable and significant fact is that the position of Russian Orthodoxy Church decline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religious reform of Peter the Great, the situ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the policy for the reform, and its influence, the author spreads her narrative and analysis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the narrative and analysis, the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is prepared as follows:

The pape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parts: the foreword, the text, and the conclusion.

The foreword briefly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in this domain, the value of the author's study, and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the paper will deal with.

The text is made up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makes a concise portrayal of Russia in both the pre-Peter and Peter periods, that is,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reform of Peter the Great.

The second mainly probes into the policy of Peter the Great for the religious reform and its real practice.

The third aims at exposing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Peter the Great's religious policy over Russian centralized system, Russian secular powers, Russian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y Church.

The conclusion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Peter the Great's religious polic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igious reform of Peter the Great.

**Key Words:** Russia; Peter the Great; Religious Policy

##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国华 日期： 2008.6.12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国华 指导教师签名： 张庆华  
日 期： 2008.6.12 日 期： 2008.6.12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_\_\_\_\_

电话： \_\_\_\_\_

通讯地址： \_\_\_\_\_

邮编： \_\_\_\_\_

## 引 言

在俄国历史上，彼得大帝时期是一个农奴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业资本、工业资本萌芽，沙皇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历史转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彼得大帝开始实行欧化改革。“彼得大帝进行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拉开了俄国现代化的序幕。”<sup>①</sup>在这一改革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彼得大帝对俄国宗教及教会问题采取的诸多措施起到了重大作用。它一方面促使俄罗斯正教会<sup>②</sup>发生深刻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正教会在俄国社会中所一贯享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俄国以后的历史进程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宗教改革及相关政策的历史重要性，使得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向纵深领域扩展的必要性。通过对关于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改革及相关政策的研究成果进行阅读与研究，笔者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宗教改革及相关政策的研究大多体现在如下几大方面：

一、对彼得大帝的专门性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是一些有关彼得大帝的个人传记，主要包括中国学者的著作和译著两种，其中译著的典型代表有苏联学者 B. B. 马夫罗金的《彼得大帝传》、苏联学者尼·伊·帕普连科的《彼得大帝传》和法国学者亨利·特鲁瓦亚的《彼得大帝》等。

二、对彼得大帝改革的专题性与总体性研究。专题性研究主要体现为该领域的译著和中国学者自己的著述。译著主要有苏联学者 B. B. 卡芬加乌兹和 H. И. 巴甫连科主编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上、下册），中国学者自己的著述主要有陶惠芬的《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总体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通史类著作（包括译著和中国学者的著述）当中。这类著作有：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第三卷）、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编写的《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 1917 年）》、孙成木和刘祖熙等主编的《俄国通史简编》（上、下册）、张建华的《俄国史》和曹维安的《俄国史新论》等等。

<sup>①</sup> A. H. Медушевский.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Текст》, 1994. С. 47.

<sup>②</sup> 俄罗斯正教会是东正教中最大的一个自主教会，是基督教于公元 10 世纪末从拜占庭传入基辅罗斯后建立起来的。转引自[苏联]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俄国教会史》，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页。

三、对彼得大帝宗教改革的总体性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包含在一些有关俄国教会历史的通史类著作当中。这种通史类著作主要有：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丁士超等译的《俄国教会史》、乐峰的《东正教史》、约·阿·克雷维列夫著、王先睿等译的《宗教史》（上、下册）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对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宗教改革及相关政策等几大论题的研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个明显而重要的情况便是，国内外学者对前二者的论述较为系统、深入，成果也较为丰富。而针对后者，即彼得大帝宗教改革的政策，国内外学者则较少涉猎。虽然学者们对彼得大帝时期改革的原因、内容和影响都有涉及，但是研究的重点多在彼得大帝的“全面改革”，而非“宗教改革”，即使涉及宗教改革及其政策，也主要是从彼得大帝“全面改革”的角度进行论述，故对“宗教改革”——尤其是“宗教改革”中相关政策的论述就显得稀少。另外，笔者还发现，某些学者在同一问题的数据引用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该领域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论述较少的话题——彼得大帝宗教改革的政策——进行一番尝试性探索，为读者提供一个解析该领域问题的不同视角。

与前述研究相区别的是，笔者通过对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改革相关文献的阅读分析，试图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改革前后所发生的俄罗斯正教会的地位下降问题；彼得大帝宗教改革的具体措施和社会影响等。其中，对前一问题的探讨是本文的重点所在，亦是本文与前述研究的主要区别所在。

## 一、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政策制定的历史背景

### （一）前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16—17 世纪）

在前彼得大帝时期，“在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同荷兰、英国等国相比，俄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军事、文化教育等全面落后，在世界之林中处于被动局面。”<sup>①</sup>

在政治领域，俄国等级君主制正在形成当中，政治制度的发展不能适应中央集权的要求。1549年2月27日，俄国召开了由高级僧侣和封建贵族等代表参加的“缙绅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改革和编纂新法典。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它的召开，标志着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的确立。到17世纪，缙绅会议由两院分别举行。上院由沙皇、总主教、波雅尔<sup>②</sup>杜马和高级僧侣组成，下院由“地方人士”——各城市代表和普通贵族代表组成。在这一时期，由名门世家组成的波雅尔杜马仍然是政府的最高机构。凡重大事情，沙皇必须同杜马商量，一起发布命令，在处理具体政务时，仍沿用16世纪的“衙门制度”。随着国家事务的日趋复杂化，新的衙门得到不断增设，结果，“衙门越来越多，其数量一度达到80个。不过，在这80个衙门当中经常行使职权的却只有40个。”<sup>③</sup>这一现象昭示了俄国统一国家中央政权机关当中的不健全因素，即权限规定与部门分工不明确，机构过于臃肿。到17世纪末，衙门制度的弊端已非常突出。此时的俄国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低，贪赃枉法、盗窃国家财产的事件层出不穷。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曾试图进行一些改革，合并或重组一些衙门，但这些改革仍不能改变管理制度的混乱状态，不能适应中央集权国家和沙皇制度发展的要求。由于波雅尔在杜马中的势力最大，因此列宁称“十七世纪俄国的君主制是波雅尔杜马君主制。”<sup>④</sup>

在经济领域，16世纪俄国的主要经济部门仍然是农业，全国范围内大体采用

<sup>①</sup>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6页。

<sup>②</sup> “波雅尔”即俄国的大贵族或世袭贵族。

<sup>③</sup>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142页。

<sup>④</sup> 同上，第141页。

以三圃制和多种轮种制为主的耕作制度。由于墨守传统的耕作方法，俄国农业部门的产量很低，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到17世纪，就个别家族占有的土地数量而论，“除沙皇外，最大的地主是拥有80,000俄亩土地的波雅尔鲍·伊·莫罗佐夫和拥有120,000农户的总主教与拥有214,000俄亩的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sup>①</sup>服役贵族的人数众多，虽然每人持有的土地数量不多，但其土地面积的总和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在这一时期，俄国手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出现了地区分工。与此同时，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人数开始增多，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手工工场。由于手工工场的出现，产品中变为商品的比重增大，有些产品在当地没有销路，需要到远方去寻找销售市场，进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商品市场。到“17世纪，俄国已有约一半的城市居民参加了商业活动。”<sup>②</sup>然而由于强大的封建农奴制的束缚，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在破土萌芽后，终归因微弱无力而屈于旧式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压抑之下。

在军事领域，16世纪中叶，俄国军队的基础仍然是旧式贵族骑士，武器则是马刀和弓箭。在军队内部实行门第制度，高级将领多半由显贵出身的“波雅尔”担任，但他们之中的多数都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彼此之间常常由于门第之争而导致战争失败。17世纪，俄国尚未有海军，几乎没有正规陆军。“当时在莫斯科只有20,000名射击军<sup>③</sup>。士兵携带家属，战时打仗，平时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同时，还有90,000名新制团队<sup>④</sup>，70,000名哥萨克骑兵和25,000名外国雇佣军。”<sup>⑤</sup>军队装备很差，作战的火枪质量低劣。虽然军队有一定数量的枪炮，但由于同一规格的炮管口径大小不一，长短和重量也不一，因此很难供应炮弹。政府不能供给军队以最低限度的武器、弹药和军服，导致俄军在对外战争中屡遭失败。

在文化教育领域，17世纪的俄国几乎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国家。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目不识丁。即使是上层贵族，能识文断字的也寥寥无几，尤其是妇女中的文盲更加普遍。在“著名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中，男性成员一般都能识字，但该

<sup>①</sup>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146页。

<sup>②</sup>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8页。

<sup>③</sup> 射击军又称特种常备军，1550年由伊凡四世所建，终生服役，由国家供给武装和粮饷。

<sup>④</sup> 新制团于17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士兵源于征召，武器装备由国家供给，成员平时从事自己的职业，每年秋后，集中训练一个月。

<sup>⑤</sup>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5页。

家族的所有妇女仍全是文盲。”<sup>①</sup>宗教思想在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国家虽然有学校，但都是宗教性的，教学内容也主要是神学，教会对非宗教的知识传播持敌视态度。同时，教会还极力反对人们了解国外的发展状况，凡是从国外运进来的书籍，一经发现则予以没收或烧毁。文化教育的落后，导致国内人才极度缺乏，许多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各工业部门的技术人员都不得不靠国外聘请。这一现状，严重地制约着国家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这种落后状况，严重阻碍俄国社会进步。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虽然意识到其中的危害，并试图进行改革，但终因俄国的传统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而收效甚微。在这种“传统保守势力”当中，俄罗斯正教会的作用尤为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正教会是俄国社会改革的主要障碍。那么，俄罗斯正教会在此时期的俄国社会中究竟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

## （二）前彼得大帝时期的东正教

东正教传入俄国后的500年，是东正教在俄国社会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其融合俄国原有多神教，逐步确立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时期。此时的东正教对分散的各罗斯部落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俄国各民族逐步形成了统一信仰，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统一的俄国民族文化。东正教的传入和传播对俄国民族文化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俄国的民族文化正是以东正教文化为核心内容的。

16世纪，随着俄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教会势力也在不断增强。由于土地兼并，教会所辖的土地数量急剧增长。为了有效控制教会势力，1551年2月，沙皇召开了著名的“百章会议”，会上讨论了教会改革，决定消除各地教会的差异，建立统一的教会，实行统一的宗教仪式，消灭教会中存在的酗酒、放荡和一切舞弊行为等等。会议同时对教会的土地问题进行了讨论。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政府主张没收教会土地，将其分封给服役贵族，但遭到以大主教马卡里为首的教会势力的极力反对。结果，会议只决定将伊凡幼年时波雅尔赠送给修道院的土地上交国家，禁止王公、波雅尔向教会和修道院捐献土地，禁止修道院自行购置土地。这样，教会土地的扩大趋势得到限制。同时，政府还取消了教会和修道院不

<sup>①</sup>《苏联史纲》，第555页。转引自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194页。

纳税的特权，并对其掌管的土地面积进行了登记和丈量。

1588年，君士坦丁堡总主教伊列米亚到莫斯科筹集金钱，为了改变俄罗斯正教会对于君士坦丁堡的从属地位，当时掌握政权的俄国大贵族戈都诺夫迫使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同意在俄国建立独立的总主教区。1589年，戈都诺夫的亲信、大主教约瑟夫当选为俄罗斯正教会的第一任总主教。至此，俄罗斯正教会摆脱了对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的依附。俄罗斯正教会的国际威望得到进一步提高。1593—1594年，政府计划对修道院的土地占有权进行审查，规定修道院将无凭据占有的土地上交国家，同时，政府还派专人向修道院征收赋税，并让欠修道院债务的农民转到地主的土地上，进一步限制教会的权利。

俄国沙皇伪季米特里一世挥霍无度，导致国库空虚。1606年，他向教会强制征款。“他令约瑟夫·伏洛科拉姆斯基修道院和诺沃捷维奇修道院上交3,000卢布，以备沙皇日常费用，令白湖基里洛夫修道院上交5,000卢布，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上交30,000卢布。”<sup>①</sup>而就在此时，俄国的战乱不断，极大地消耗了俄国财政。因战乱而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死亡，大面积土地荒芜，使原本不济的俄国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充当国家税收主要来源之一的教会土地生产，也因荒芜和数量锐减而遭受巨大损失。例如：“1594年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在莫斯科周围拥有196,000俄亩<sup>②</sup>土地，而到1616年它的耕地面积只有9,800俄亩土地，仅是1594年的1/20。”<sup>③</sup>

幸运的是，到17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大修道院为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始从事商品生产。例如，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和索洛维茨修道院以出产优质呢绒和呢绒制品而著名。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增强，教会已开始不间断地干预世俗权力，这一点从1613年的缙绅会议上就可看出来。这一年，俄统治阶层的权势集团提名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为沙皇候选人。这位候选人在贵族势力和僧侣们的支持下正式即位，由此开始了俄历史上著名的罗曼诺夫王朝。从这次俄沙皇的选举当中可以得知，实际上的选举大权已经落入封建贵族和僧侣手中。

随着自身势力不断增强，俄罗斯正教会开始不甘于自己的权限，逐渐向政治

<sup>①</sup>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117页。

<sup>②</sup> 俄制地积单位，1俄亩≈1.09公顷，合16.35市亩。

<sup>③</sup>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129页。

领域渗透。沙皇米哈伊尔的父亲费拉列特，自称“大君主”，实际上，他已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1645年，沙皇米哈伊尔病故，16岁的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继位。阿列克塞为防止教会势力干预政治，他支持总主教尼康的宗教改革。但尼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主要是针对宗教仪式，并没有触及教会权力。相反，在教权和君权的关系这一点上，尼康主张教权应高于君权。他把教权比做太阳，把君权比做月亮。一时间，教俗权力的关系日趋紧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对教会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取消了修道院衙门<sup>①</sup>，然强大的世俗权力终归获胜，沙皇阿列克塞最终贬谪了尼康，以尼康为代表的教会势力试图谋取世俗权力的计划，也因此而草草收场。不过，教会的势力并没有就此衰败下去，建基于雄厚的物质基础，教会仍然强盛到可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看来，要想加强中央集权，沙皇有必要实施宗教改革，改善世俗权力运作的环境。一场涉及教会权力与地位的改革势在必行。

### （三）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时代特征

彼得大帝于1682年继位。此时，西欧的荷兰与英国，资产阶级已取得革命胜利，资产阶级政权已稳固，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得到较大发展。欧洲其他国家虽然尚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但封建关系已趋于瓦解，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但是，作为一个久为封建农奴制国家的俄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在文化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前述这些西欧国家。政治上，由于少数贵族把持国家大权，地方割据势力强大，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农业方面，长期盛行三圃制和多种轮种制方法，致使俄国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业生产所取得的进步也不明显，从而很难改变俄国经济领域“自给自足”的局面；工业方面，17世纪末，全国手工工场中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是农奴，呢绒、纺织、武器装备等各种工业产品，几乎都靠进口。俄国的商业发展也很缓慢，对外贸易完全操纵在外国商人手中。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彼得继位初期，俄国没有一支正规军，更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至于对外开战时一度失利。科技、文化与教育事业都相对落后。

在这种情况下，彼得作为“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于1697—1698年毅然随使团到普鲁士、荷兰、英国和奥地利等国家考察和学习。西欧之行，使彼得进一

<sup>①</sup> 1650年设立，是一种负责审理所有主教、修道院当局、司祭、教堂教士以及所有教会所属人员和农民（牧首所属人员除外）的民事案件的机构。

步地认识西欧,看到俄国与西欧之间的巨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考察和学习为他后来改革思路的形成和宏伟计划的实施铺就了道路。彼得意识到,只有积极推行国内改革,加强沙皇的权力,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增长的需要以及地主阶级与新兴商人的利益,才能有效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增强俄国的国家实力。为此,彼得立下为国效劳的决心,正如他写道:“为了我的祖国和人们,我没吝惜过自己的生命。”<sup>①</sup>他通过研究西欧各国的情况,结合本国实际,设计出一套颇具俄国特色的全面欧化而不同化的改革路线。在这套方案的指导下,俄国进行了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等诸领域的改革。

早在前彼得大帝时期,教会就通过依附世俗政权,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讨,在社会系统中成为领导阶层。同时教会拥有自己的特权,可以随意支配教会财产收入,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独立的审判权等。随着自身势力不断膨胀,教会开始不甘于在精神层面的领导地位,越来越多地向世俗政权领域渗透,“如果用一名著名的宗教隐喻来说就是‘教士要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产生和皇帝冲突的问题’”<sup>②</sup>。

到彼得大帝继位初期,教会的发展状况有所变化。此时,国家曾下令将部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并主张由世俗官员来管理修道院的领地,然而“在18世纪的前20年里,教会还是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土地上的农户数量约占全国农业人口的1/5。”<sup>③</sup>此时的教会经济实力并没有被削弱。这些遍布各地的教会地产,不仅与世俗贵族争夺劳动力,而且严重影响了国库的收入,特别是当彼得大帝在国内实行的全面改革触及到各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时,教会中的反对势力纷纷组织起来反对改革。这股改革的重大阻力,显然已严重威胁到俄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要想突破阻力,就必须对教会采取进一步措施,这样,一场深层次的社会变革便正值其时了。

<sup>①</sup> [苏联]В. В. 马卡罗金著:《彼得大帝传》,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2月第1版,第277页。

<sup>②</sup>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IX-X ве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2,С.186.

<sup>③</sup> Н.А.Смирнов.Церковь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IXв-1917г) .Москва,1967, С.163.

## 二、彼得大帝时期宗教政策的内容与实施

政策，简言之，就是“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包括执政党和政府）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为调整一定社会的利益关系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是执政者的特定价值取向和策略措施的有计划的实践活动过程。”<sup>①</sup>而“宗教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依据其对待宗教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制定并实施的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准则和具体措施。”<sup>②</sup>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彼得大帝时期的宗教政策就是指彼得在位期间处理宗教问题的行为准则，这一政策服从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全面改革的目标，意在把神职人员改造成成为沙皇专制制度服务的人。而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是宗教改革的具体措施，可分为对宗教机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等问题的管理。

彼得大帝时期的宗教政策包括彼得在位期间实行的一系列宗教改革措施，集中体现在彼得于 1721 年颁布的《宗教章程》（简称《章程》）里。旨在对教会进行管理的《章程》由三部分组成：宗教管理委员会（很快改名为主教公会组织）成立的原因、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职能和宗教管理者自身的义务、行为和效力等。作为宗教改革的指南，《章程》的颁布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在彼得大帝实施欧化改革的过程中，教会中反改革的势力不断干预政治，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有违上帝的意旨；面对教会在改革中的立场及教会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彼得大帝决定对教会进行改革。改革的直接原因也不难理解：一方面，由于教会经济实力强大，限制和没收教会财产有利于国家世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历史上教权凌驾皇权的教训对于彼得这位沙皇来说记忆犹新，为避免历史重演，彼得大帝意识到对教会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第三，“国家干预教会事务，是因为国家需要利用教堂和寺院当时所拥有的大量财富”。<sup>③</sup>彼得大帝意识到这个财富对沙皇政府有着巨大的利用价值——既可以帮助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助于他号召人民支持自己的各项改革，同时还可以为俄国的对外扩张效力。

<sup>①</sup> 潘强恩：《政策论》，西苑出版社，1999 年 6 月版，第 7 页。

<sup>②</sup> 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宗教文化出版社，第 2002 年版，第 2 页。

<sup>③</sup> [苏联] Б. Б. 卡芬加乌兹、Н. И. 巴甫连科著：《彼得一世的改革》（上册），郭奇格、陈明、冯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440—441 页。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彼得颁布了《宗教章程》。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依照《章程》而行的宗教政策所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新政策使俄国世俗政府和管理重要事务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从此以后，世俗政府主要通过“高等检察官”或“高等律师”——一个位于“圣会”之中的常任世俗官员来施加它的影响。”<sup>①</sup>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过去而言，这种新政策“将俄罗斯正教会置于国家更为紧密的控制之下，并且消除了彼得大帝所怀有的对一个强大的、可能反对其工作的教会领袖的恐惧。”<sup>②</sup>

### （一）改组宗教管理机构

在俄国，俄罗斯正教会所实行的教会管理制度是以牧首为领导的牧首制。俄罗斯正教会原受君士坦丁堡教会管辖，到了1589年，在沙皇的支持下，俄罗斯正教会举行会议，会议决定正式建立教会牧首制，确定牧首为教会的最高领导。自此，俄罗斯正教会成为独立的牧首区。牧首为报答沙皇的支持，不遗余力地维护沙皇君主专制，宣称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sup>③</sup>。所有人都要服从沙皇的旨意。这一情况持续到尼康改革，尼康牧首拥有大量的财富，“在担任牧首不太长的时间里，他就成为仅次于沙皇的全国第二号富翁了”<sup>④</sup>同时他还是个权欲熏心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教权干预政治，还提出“教权高于皇权”的主张。沙皇支持尼康改革，是为了让教会能更好地服务于皇权，但适得其反。

到彼得大帝时期，彼得大帝不甘于俄国的落后现状，决定引进西欧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欧化改革。但教会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一直站在彼得改革的对立面。“政府考虑到，神甫手中最有力的斗争工具之一就是宗主教制”，<sup>⑤</sup>俄罗斯正教会中的上层指责彼得的改革政策背离了东正教的教义，是受罪恶意指使所致。因此，他们极力反对彼得大帝聘用外国专家、兴办学校的教育改革，也反对彼得创建海军、改编陆军的军事改革。俄罗斯正教会牧首认为改革的任何一项措施都是叛教行为。随着彼得大帝改革的进行，政教矛盾不断加剧，东正教反

<sup>①</sup> Vernadsky George, Fisher Ralph T, Jr., Ferguson Alan D, et al.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1917[G]. Volume 2.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p.370-371.

<sup>②</sup> 同上，p.371.

<sup>③</sup> 任继愈主编：《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34页。

<sup>④</sup> 同上，第137页。

<sup>⑤</sup> [苏联] Б. Б. 卡芬加乌兹、Н. И. 巴甫连科著：《彼得一世的改革》（上册），郭奇格、陈明、冯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2页。

政府的政治案件也因此而日益增多。据统计，此类案件“1659年5起，1700年16起，1701年12起，以后，每年大约10—12起”。<sup>①</sup>

针对教会的反改革立场，彼得大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意在加强中央集权。1700年末，教会反对派中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牧首阿德里安去世。此时，彼得大帝正在纳瓦尔同瑞典打仗，但当他得知此事后，立即采取措施，任命不反对改革的梁赞地区主教斯特凡·雅沃尔斯基为代理大主教。同时，彼得启用支持改革的普斯科夫主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让他根据自己的意旨，制定《宗教章程》。

彼得大帝根据以往教会牧首曾企图取代沙皇，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教训，彼得决定对宗教的管理机构进行改革，他强调：“俄国现在不需要大牧首，我给你们立了一个新的大牧首，它就是这个《宗教章程》。”<sup>②</sup>根据章程规定，彼得阐述了他改革的理由：在建立主教公会之前，国家会出现“因（只有）唯一的一个精神领袖而发生暴动和骚乱的情况，因为普通百姓并不知道如何区分教权与专制政权，但他们还是对至高无上的牧师的荣誉和声望感到惊讶，以为这一领袖就是与专制君主平起平坐的第二个国君”<sup>③</sup>；担心民众“对教会领袖的支持多于对世俗领袖的支持”<sup>④</sup>；但是，这种情况在建立主教公会的政府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人们看到，宗教会议政府是根据君主命令和参议院决议建立的，他们就会永远更为温顺，并彻底抛弃教会官员会帮助他们造反的希望”。<sup>⑤</sup>

彼得大帝改革教会的另一个原因是教士生活的腐败。例如：1660年12月，人们在莫斯科发现一封暗中投下的信件。此信件虽然是在反对官方改革的时候写的，但其中对俄国教士生活进行揭露的内容不无重要价值。它使得众多高级神职人员因此而惊恐不安。该信用生动的语言写道：“世界上的神甫犹如躯体中的灵魂。于是，众人皆知，主教取代了上帝的一切，而神甫取代了基督，其他的人则取代了神圣的天使。而我却以为，已经没有一个主教在过主教的生活，没有一个神甫在过神甫的生活，没有一个修士在过修士的生活，没有一个基督徒在过基督徒的生活；他们都蔑视自己的职衔；主持司祭们抛开自己的修道院，而去同世俗

<sup>①</sup> 戈利科娃：《彼得大帝时期的政治案件》，第130—131页。转引自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158页。

<sup>②</sup>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50页。

<sup>③</sup> [苏联]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俄国教会史》，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第221页。

<sup>④</sup> 同上，第221页。

<sup>⑤</sup> 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 www.komitet.ru, С.1.

的人妻和少女调情做爱；神甫们不是进行训诫工作，而是热衷于经常作午祷和向上帝供献防止抢劫和淫乱行为的香炉，并将自己卑鄙肮脏的生活展示给众人，伪善的装出虔诚的面孔，想以经常进行午祷使得上帝大发慈悲，但他们行为卑劣且纵欲无度，恶习累累，上帝的话也不想听。关于这种人有一种说法：他们轻蔑的诅咒上帝的事业；无端的不接受上帝的名字。如何是无端？既然受洗，信了基督，却又不是像基督那样生活。这些人将像鬼魔一样被判受永罚。”<sup>①</sup>很明显，这封信的内容展示了教会生活的腐化。无独有偶，一位俄国“祈祷者”（即教士）在给牧首约瑟夫的信中说道：“你的施按手礼的神职人员仅仅在名义上是牧人，而实际上是一些豺狼；仅仅在口头上和表面上是训诫者，而在内心里却是一些狠毒的折磨者”<sup>②</sup>。另一个教士也以同样的口吻给苏兹达尔大主教谢拉皮翁写信道：“莫非想逃避上帝的审判？请记住圣书里的话：容忍豺狼的人自己也会变成豺狼而成不了牧人。”<sup>③</sup>

上述种种都反映了同一种情况，即教会管理机构已不再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为了改变此种现状，他首先废除了牧首制，取消了教会的独立性，确定了管理教会的新体制，即主教公会（由沙皇任命几名最高主教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主教公会集体领导代替牧首一人领导。

这样，教会便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正式由“宗教院”单一领导。在随后的时期里，宗教院又改名为宗教事务管理总局，取代了大主教的权力，统管所有的教会事务。宗教事务管理总局局长由沙皇从非宗教人士中挑选。第一任总局局长是波皮蒂纲，他是沙皇所中意的合适人选，一位精力充沛的军官。宗教事务管理总局的局内其他官员，也像世俗官吏一样，由沙皇政府任命，并宣誓效忠沙皇，无条件地执行沙皇的全部圣谕。照此看来，沙皇实际上已成为俄罗斯正教会的“最高牧首”。按照《宗教章程》规定，教会仅限于在精神领域内开展活动，绝不允许干预政治。鉴于教会一直反对彼得大帝改革，彼得还规定：如果遇有信徒忏悔的内容涉及反对彼得的阴谋，教会便丧失为忏悔者严守机密的权利。至此，教会的力量被空前削弱。为了“国家利益”，神甫为忏悔者保密的一贯作法形同虚设。

<sup>①</sup> [苏联]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俄国教会史》，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第138页。

<sup>②</sup> 同上，第138页。

<sup>③</sup> 同上，第139页。

通过诸多改革措施，沙皇最终把俄罗斯正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管辖之下，使其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便有“教会从属于国家，僧侣用于国家工作者”<sup>①</sup>的状况出现。

## （二）限制或没收教会财产

前彼得大帝时期，教会地产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据统计，在16世纪后半期，“仅当时的特维尔县境内的修道院和教会土地就达40,000俄亩，包含60个村和1,298个庄。约瑟夫修道院在1591年已拥有约40个乡，土地总面积约为26,067俄亩。世袭领地遍及包括莫斯科县在内的11个县份。”<sup>②</sup>“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拥有的大小村庄数目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各个修道院占有土地规模的概念：该修道院有11个大村镇和24个小村庄，而且它还不是最富的。”<sup>③</sup>由于拥有庞大的地产和广泛的特权，教会实际上已成为“国中之国”。都主教对教会土地上的居民拥有无限权力，并设有自己的组织管理机构。虽然政府曾不断的限制教会发展，但教会作为俄国最大的封建主，仍拥有巨额财富，其拥有的特权激起了贵族和城市上层商人的不满。不过，教会在发展自身经济实力时还是有所顾忌。在1580年的宗教会议上，会上曾颁布这样一项决定：禁止向修道院捐赠世袭领地来追悼亡灵，并规定用捐赠钱款来代替，而且还完全禁止教会中的个人和机构购买土地和接受土地抵押。

遗憾的是，上述决定在一时间并未得到执行，因此时俄国尚处在“混乱时期”<sup>④</sup>。但在1649年，此决定有幸被立法者重新提上议程，并在新时期的法典编撰中将之加以恢复和扩充，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法律而不是一个专门的教会决定来贯彻实施。缙绅会议法典（即1649年法典）第17章第42条规定：“牧首、都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以及修道院均不得购买任何人的祖遗、封赏和购买的领地，

<sup>①</sup> [美]马克·拉伊夫著：《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蒋学祯、王端译，新华书店，1996年12月第一版，第46页。

<sup>②</sup> 杨翠红：《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99页。

<sup>③</sup> [苏联]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俄国教会史》，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第73—74页。

<sup>④</sup> 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变乱迭起，遭受外国干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历史上称之为混乱时期。转引自[苏联]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俄国教会史》，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第127页。

也不得收作抵押，不得私人占有，也不得将任何一份地产收作永久的礼物；并且不得在领地衙门中将这些领地登记在牧首、都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以及修道院名下；而任何世袭领地均不得向修道院捐赠世袭领地；若有人立下遗嘱将世袭领地捐赠修道院，则不应照遗嘱将该领地交修道院，而应由其父亲（亲属）将该领地所值或死者在遗嘱中所写之领地价格的钱款捐送修道院；若有人于此法典颁布之后将其全部祖遗或封赏、购买的世袭领地出卖或者抵押、或捐赠给牧首、都主教、大主教或主教、或某一修道院，则该领地将无偿地收归国君所有并分赐给就该领地向国君具禀之人。”<sup>①</sup>作为对所有教士（不仅是修道院的教士，还有其他教士）的一项共同措施，法典还规定：一切非宗教案件均属与普通人一样的法院管辖。最后，这一法典完成废除民事和刑事案件方面教会对其所属人员的司法权过程。缙绅会议法典的这些规定，给教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它使教会丧失大量的诉讼费收入。根据会议的规定，第二年便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即修道院衙门。该衙门由世俗人士、杜马贵族和司书组成，职能是负责审理所有主教、修道院当局、司祭、教堂教士以及所有教会所属人员和农民（牧首所属人员除外）的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方面，宣布所有教会所属人员（包括牧首所属人员）均归侦缉衙门和刑事衙门以及地方军政长官审理。通过对 1649 年法典条例的实施，教会的发展受到了较大限制。但是，教会还是会利用手中的特权，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以保障自己的经济地位。例如：“1649 年教会修道院控制的村庄农户数为 8.8 万，到 1678 年教会修道院控制的村庄农户数增长到 9.8 万。教会手中共有 11.6 万农民，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13.3%，而同时期国家所占有的农户才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10%。大牧首个人所占有的农户在 1649 年为 6,432 户，到 17 世纪末增加到 9,326 户。教会在城市里也占有地产，17 世纪中叶达到 5,000 户。这些地产称“白地”，即不向国家纳税的村镇。”<sup>②</sup>从上述材料中，我们能够看到，教会成为了 17 世纪俄国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

到彼得大帝时期，教会地产虽已历经几代大公、沙皇的限制和削减，但教会仍然掌握着庞大的地产，并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实力。例如：“1653年至1654年总主教和高级僧侣的世袭领地农户总数为17,323户，到1718年总主教和高级僧侣

[苏联]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俄国教会史》，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第73—74页。

<sup>②</sup> Н.М.Кумиров. Россия в XVI веке. Москва, 1962, С.58.

的世袭领地的农户总数为28,823户,即增加了11,500户。131所修道院的世袭领地上所拥有的农户数为83,049户,到1718年131所修道院的世袭领地上拥有农户数为112,855户,即增加了29,806户。”<sup>①</sup>不仅如此,身为教会重要组成部分和力量实体的修道院还在经济基础之上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修道院既是占有大量土地和农奴、兼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庄园,又是拥有武装力量的军事基地。据查,“索洛维茨修道院,是俄国最大的修道院之一。在15—18世纪期间,是俄国最大的封建主之一,拥有大片土地和大批依附农民,它的经济来源是从渔猎、采矿、制盐、采珍珠、贸易等行业中获得的。17世纪60年代每年售盐达14万普特。这所修道院内有牢固的城墙碉堡,曾有1,000人的卫队,16—17世纪时多次击退外国军舰的进攻。”<sup>②</sup>“18世纪初,宗主教、高级僧侣、寺院和教堂所拥有的农户总数已达154,196户。”<sup>③</sup>拥有如此经济军事实力,教会不能不让官方感到忧虑。彼得考虑到,率先从经济上入手可以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特别是有利于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因为进行军事改革急需大量的资金,而教会和修道院既有大量土地,又有巨额财富,这正符合自己的需要。

1701年,彼得政府下令将部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由世俗官员来管理修道院的领地。这一措施有效限制了教会经济实力的恶性膨胀。有关教会事务方面的管理,则由重新恢复的修道院衙门负责。修道院衙门刚一成立,就奉旨宣布:修道院和大主教的一切财产都要进行核实登记,国家可以出卖教会地产,各类人员凡每年能够支付代役租者,均可购买教会土地。据统计,“仅1701—1705年,国家就从教会手中剥夺了1,800户农户和大量土地。”<sup>④</sup>“仅1701—1711年,国家从寺院世袭领地获得的收入为100多万卢布。”<sup>⑤</sup>恢复并扩大职能的修道院衙门,现在负责管理教会的全部经济事务,全权处理教会的财产收入。“世俗化的修道院衙门每年发给每个修道士的薪俸,不论职位高低一律规定为每年每个修道士10个卢布和10俄石<sup>⑥</sup>粮食。”<sup>⑦</sup>此外还规定,教会土地上的居民除教士与

<sup>①</sup> Н.А.Смирнов.Церковь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IXв-1917г).Москва, 1967, С.163.

<sup>②</sup> 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sup>③</sup> [苏联]Б.Б.卡芬加乌兹、Н.И.巴甫连科著:《彼得一世的改革》(上册),郭奇格、陈明、冯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1页。

<sup>④</sup>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161页。

<sup>⑤</sup> [苏联]Б.Б.卡芬加乌兹、Н.И.巴甫连科著:《彼得一世的改革》(上册),郭奇格、陈明、冯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4页。

<sup>⑥</sup> 旧时俄国的容量单位。(散体物)1俄石=209.91升;(液体)1俄石≈3.08升。

<sup>⑦</sup>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161页。

教会职员以及家属外，均须一律服兵役；同时，还规定教会修道院负有赡养老弱病残官兵并为宗教事务提供经费的义务。

到 1705 年，发给每个修道士的薪俸标准被减少了一半，教会被剥夺了经济自主权。修道院衙门还将修道院的领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符合规定的领地，其收入用于满足修道院本身的需要；另一类则是超过规定的领地，由修道院衙门任命的官员管理，这类领地的所有收入都要上交国库，以满足国家的改革需要，首先是满足军事上的需要。按彼得政府的规定，“每年从修道院衙门的经费中提出 15,000 卢布来供养一个团，给炮兵衙门 17,000 卢布。”<sup>①</sup>至此，彼得实施的教会改革政策，不仅使教会失去对自己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而且还加重了教会的经济负担。过去，教会财产免交一切税收，现在却要交纳沉重的赋税。特别是在修道院衙门的控制下，教会每年都必须把剩余款项全部上交到国库，从而使自身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损失。据统计：“1720 年，教会将剩余的 31,075 卢布上交给了国库，1724 年，又将 83,218 卢布上交给了国库。”<sup>②</sup>彼得大帝的这些措施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的经济独立基础，逐渐把教会的世袭领地和其他财产转到世俗贵族手里，把修道院变为支援国家改革发展的经济机构。总之，通过教产还俗，彼得从经济上打击和削弱了教会势力，使教会的收入和财富为国家所用，并使教会的发展依附于国家政权。

### （三）打击反对改革的宗教势力

随着彼得大帝改革的不断进行，教会上层中的保守势力开始反对彼得的改革措施。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反改革势力针对彼得大帝去除俄国式“大胡子”的措施所表现出来的指责和抗议。在彼得大帝看来，胡子是守旧的象征，是反对新事物的抗议标帜，因此他在政令中宣示：剪胡子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他强迫反改革的教士们实施这一规定。但却遭到了教会的激烈反对。教会认为，胡须是上帝赐予的装饰品，是俄国人引以为傲的珍品。胡子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只须听听彼得的同时代人、俄国大主教阿德里安的言说就能知晓。“阿德里安把没留胡子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布剪胡子的作法是一种大逆不

<sup>①</sup> [苏联]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俄国教会史》，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16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217 页。

道的罪孽。”<sup>①</sup>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彼得决定对留胡子的人征收蓄胡税。教俗矛盾由此加剧，东正教反政府的政治案件日益增多，据统计：“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sup>②</sup>审理的政治案件中，东正教上层僧侣犯案比例占 20%。1699—1705 年期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共审理 300 起政治案件，其中，东正教僧侣的案件占 67 起”。<sup>③</sup>其中，塔利茨基案件是这些案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起。

塔利茨基是东正教上层保守势力的代表之一。针对彼得的宗教改革措施，他极力散布“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彼得是“敌基督者”的言论。所谓“世界末日的到来”就是指彼得实行的改革政策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所谓“敌基督者”就是指彼得是东正教的共同敌人。塔利茨基认为，彼得大帝采用新纪元、要求穿西装和剃胡须等政策是对原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对这个现存世界的改变，这说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为了不使“世界末日到来”，塔利茨基制定了反对彼得及其改革的纲领，公开号召信众停止向沙皇政府纳税，拒绝完成国家义务。他甚至提出，当彼得大帝上前线指挥作战时，把全国各地的射击军调集到莫斯科，发动政变，推翻彼得政权。

1700 年 6 月 28 日，塔利茨基被告发，他随即畏罪潜逃。罗莫丹诺夫斯基<sup>④</sup>对此案十分重视，一方面悬赏 500 卢布的金额捉拿塔利茨基，另一方面到塔利茨基的家里搜查。在塔利茨基的家中，他搜到了一份刻在梨木板上的“告人民书”，其主要内容是推翻彼得政权。8 月底，塔利茨基被捉拿归案。在审讯中，塔利茨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他的首要任务是“把‘告人民书’散发出去，煽起暴动，杀死沙皇。”<sup>⑤</sup>与此案有牵连的 17 人全部被捕入狱。经审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判决：“塔利茨基、阿尔塔蒙·伊凡诺夫、伊凡·萨文因蓄意杀害沙皇彼得罪，被处以极刑。卢卡·安德列和戈利高利·伊凡诺夫牧师因知情不报罪，被判处死刑。伊格纳契主教被免去教衔，流放到索洛夫基，霍万斯基死于狱

<sup>①</sup> [苏联]尼·伊·帕普连科著：《彼得大帝传》，斯庸译，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75 年版，第 77 页。

<sup>②</sup>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机构名称，彼得时期新设的衙门，是彼得时期俄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政治侦察活动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捍卫国家政权，镇压一切反政府的犯罪活动。这个衙门高于其他衙门之上，有权向中央和地方机构下达命令，是当时俄国权力最大的一个衙门。

<sup>③</sup> 戈利科娃：《彼得大帝时期的政治案件》，第 130—131 页。转引自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58 页。

<sup>④</sup>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的掌管者。

<sup>⑤</sup> 戈利科娃：《彼得大帝时期的政治案件》，第 130—131 页。转引自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59 页。

中。罪犯们的妻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他人分别被处以鞭刑和烙印。”<sup>①</sup>

塔利茨基案件表明，东正教上层保守势力是反对彼得改革政策的强势力量，宗教以其特有的方式向彼得及其政权发起进攻。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彼得大帝对反改革的教会势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击。

俄国修道士在当时是一个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阶层，是反对教会改革的主要力量，经常参与各种政治密谋。彼得大帝对待修道院和修道士向来慎重。1701年他下令对修道士的活动严加监视，禁止修道士在他们的房间里书写任何信件，并禁止他们在房中保存纸和墨水。如果确实需要书写时，他们需获得上级同意，在餐厅的特殊角落里书写。彼得的这些措施意在防止修道士书写反政府的煽动性信件。为了节省修道院开支，彼得大帝还下令将居住在修道院里的俗人迁出，如教堂合唱队员、抄写员等，这些人的现有职责改让修道士自己去履行。

由于修道士利用各种手段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彼得竭力主张缩减僧侣人数，限制修道院人员数量。彼得下令禁止修道院人员随便迁移，将他们禁锢起来，以便政府对修道士进行统一管理。1701年，彼得大帝在一道敕令中提出，教士要以古代的僧侣为榜样，做到“用自己劳动的双手为自己生产食物，共同生活，还用自己的手养活许多乞丐。”<sup>②</sup>同时，彼得还把退伍的伤残士兵、年老者、病患者以及一些贫困者分派到各地修道院，要修道士负责供养这些人。此外，彼得对“分裂运动”<sup>③</sup>中的分裂派教徒也给以严格限制，要他们交纳双倍的人头税，不让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甚至还要他们穿上特殊制服，以示区别。

1722年，宗教事务管理局根据彼得大帝的面谕，发出一道指令。根据指令，一切神职人员，在获悉教徒中有反政府的念头时，必须立即密报政府当局，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并规定神职人员不论地位高低，一律只能吃一份简单的口粮，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sup>①</sup> 戈利科娃：《彼得大帝时期的政治案件》，第130—131页。转引自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159页。

<sup>②</sup>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159页。

<sup>③</sup> 按传统意义来解释，这一术语是指旧礼仪派的分裂运动，也就是忠实于尼康改革以前的旧礼仪脱离官方教会的宗教派别和组织的总和。

### 三、彼得大帝宗教政策的影响

#### （一）俄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强化

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这次改革，俄国沙皇能够把同王权争夺权力的教会置于自身的领导之下，能够把管理教会的机构置于政府的统治之下，并且能够把大量的从教会那里剥夺来的财产用于国家机构的各方面运作。通过 1721 年 1 月 25 日颁布的《宗教章程》，彼得大帝更是能够废除俄国总主教的职衔，能够设立宗教管理局，并且亲自任命该局的总局长。

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极大地削弱了教会的经济实力，为国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特别是对国家机构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宗教章程》规定由世俗力量设立主教公会，全权管理教会事务，这就为以俄国沙皇为代表的世俗力量跻身教界、最终削弱教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主教公会没有常设成员，所有的成员都是临时的，由沙皇从高级神职人员中任命。

《宗教章程》为高级神职人员提供了有关他们职责的详细规定，也提醒主教们要“懂得自己荣誉的限度”<sup>①</sup>，不要妄自尊大。根据 1722 年 4 月 22 日的参议院法令，神职人员必须进行宣誓，誓词中说明了他们的职责：教士们保证做沙皇及其合法继承人的“忠实、善良和恭顺的奴隶和臣民”<sup>②</sup>；捍卫和保护沙皇政权，报告一切有害于沙皇政府的情况。综观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教士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在俄国正教居民中培植忠君思想，在教民中培植政治密探。通过彼得大帝的改革，教会彻底依附国家政权，成为沙皇统治的驯服工具，为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效劳。至此，沙皇的专制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彼得大帝改革中“将教会改造为沙皇统治的驯服工具”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如下事实中：政府不仅要求教会在宗教事务方面隶属于自己，而且还要神职人员和教徒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为自己效力。例如，俄国沙皇要求神职人员用宗教权威来美化、颂扬自己的权威，同时要求他们把沙皇君主专制制度神圣化，要求神

<sup>①</sup> 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 www.komitet.ru, С.12.

<sup>②</sup> 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 www.komitet.ru, С.12.

学院所有成员效忠于他，让他们在就职时宣读以下誓词：“我再次以全能的上帝名义发誓，我愿意并且应该为天赋的真君，最光辉、最强大的国王，全俄国的沙皇，沙皇彼得一世尽忠，尽忠，尽忠。”<sup>①</sup>通过一系列改革政策，彼得大帝基本上消灭了改革道路上的反对势力。

教会改革中反改革势力的消灭，使俄国政教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俄罗斯正教会一直试图保持着与世俗君主政权相对的独立性，甚至一度想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虽遭到了沙皇专制的强烈压制，但它仍然有着强大的声势。而到了彼得大帝时期，由于改革的作用，使俄罗斯正教会的权势受到严重打击。沙皇彼得从管理机构层面入手，努力调整政教关系，削弱了俄罗斯正教会的经济实力，使其失去独立的经济基础，从而真正改变了教会在经济政治领域权倾一方的状况。需要注意的是，彼得的改革并非将教会完全逐出权力的场域，使其同世俗力量完全脱离干系，而是要让教会服从于政府的权威，为世俗政权效力。如此，我们便容易理解为何经过彼得改革，俄国政教关系体制得到了明显强化。在这种被强化的体制下，俄国沙皇既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同时又是俄罗斯正教会的最高首领；教会的全部活动都必须按照沙皇的意旨；国家建立由沙皇政府管辖的最高宗教管理机构，在此机构中任职的神职人员必须宣誓效忠沙皇等等。这样，皇权就把教权紧紧地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中，使教会真正成为沙皇专制制度的“御用衙门”<sup>②</sup>，成为沙皇用来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特殊工具。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东正教确立了它在俄国人精神生活中的特殊性地位。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前彼得大帝时期的那种“在辅佐沙皇的两大重要谋事机构——大贵族杜马和缙绅会议中，都有教会的代表参加”<sup>③</sup>的局面得到了有效控制。教会行事亦须经常接受沙皇的指令和监督。至此，在这种以加强专制制度为宗旨的全方位改革运动中，俄罗斯正教会内部以自治管理为特征的牧首制被取消，教会从此被纳入了世俗化管理的轨道。

总之，彼得大帝的教会改革，从政治上把教会这一曾对其改革大业产生巨大阻碍作用的力量一步一步地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中，使其失去任何反对沙皇政权的可能与条件，并逐步将教会改造成沙皇统治的驯服工具，这对于提高国家的行政

<sup>①</sup>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sup>②</sup> 蒋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9期，第48页。

<sup>③</sup> 戴桂菊：《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第55页。

效率、防止封建势力分裂、巩固国家统一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彼得大帝的教会改革措施对以后俄罗斯正教会在俄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了俄罗斯正教会未来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命运。

## （二）俄国俗产实力的增强

教会占有大量地产，且享有不纳税特权，这不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也加重了人民负担。教会中大量神职人员不劳而获，过着寄生生活，闲置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没收了大量的教会财产，把多余的部分收归国有，把教会地产部分还俗，不仅打击了教会的经济实力，而且增加了国家的经济收入，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应。此外，彼得大帝还采取限制修道院人员定额，裁减僧侣人数等一系列措施，扩大了社会劳动者数量，有效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彼得大帝把上交的教会财产，大部分都用作军事改进，使俄国军事力量大为提升。在“17世纪，俄国没有海军，几乎没有正规陆军。”<sup>①</sup>而到1724年，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已拥有装载50—96门大炮的战列舰32艘、三桅巡洋舰16艘、双桅侦察舰8艘、帆桨大船85艘、螺旋桨小船300余支。”<sup>②</sup>陆军拥有3俄磅重炮弹80枚，6俄磅重炮弹6枚，8俄磅重炮弹12枚，12俄磅重炮弹3枚。<sup>③</sup>正规陆军在1725年已发展到“俄国野战军大约有13万人、卫戍部队和民兵大约有8万人、非正规军和乌克兰军队达11万人。”<sup>④</sup>麦恩斯坦在文章中证实道：“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炮兵能达到俄国炮兵的水平，更谈不上超过他们。”<sup>⑤</sup>他指的是俄国的一万三千门大炮。改革的成绩最终被应用在俄国的对外战争上，并且取得了相当成效。如：“军事实力的增强，为北方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供给。这一切保障了战争的持久进行，使俄国最终打败了欧洲海上强国瑞典，赢得了北方战争

<sup>①</sup>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5页。

<sup>②</sup> 波诺马廖夫：《俄国通史》，第3卷，第248页。转引自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63页。

<sup>③</sup> Л.Г.Бзскровный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и флот в XVIIIвеке. Москва, 1958. С. 43.

<sup>④</sup> 波诺马廖夫：《俄国通史》，第3卷，第244页。转引自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66页。

<sup>⑤</sup> 亨利·特鲁瓦亚著：《彼得大帝》，齐宗华、裘荣庆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

的胜利，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打开了通往欧洲的门户。”<sup>①</sup>同时因改革而得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也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包括宗教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打破了俄国闭关自守的落后状态，国家把教会改革没收的财产，一部分用于俄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同样取得了成效。到1725年，俄国已建立起多个近代工场，工场内部也有较细分工，而且有不少较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例如，“莫斯科呢绒手工工场有1,016名工人。”<sup>②</sup>“斯科的官营造帆工场计有1,162名工人，谢郭林制呢工场计有730名工人，官营米克连也夫制呢工场计有742名工人。”<sup>③</sup>雇佣工人人数也有了较大增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一定发展。在众多工业部门当中，俄国的冶金工业发展最为迅速。据估计，“俄国在1718年生铁的产量约为160万普特。英国在18世纪中叶生铁的产量大约为180万普特。”<sup>④</sup>对比说明，俄国生铁的产量在彼得时代已相当可观。俄国工场工业的发展，随之引起了俄国国民经济结构的明显变化。城乡商业贸易开始全面向资本主义转化，俄国已积极地参与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商业竞争中。

### （三）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彼得大帝宗教改革促进了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早在彼得改革前，俄国的文化教育为教会所把持。“17世纪的俄国，全国仅有两所教会学校：一所是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院，另一所是在基辅的斯拉夫——基辅——莫什梁斯卡娅学院。”<sup>⑤</sup>教会学校教育的内容重在宗教神学思想的灌输，忽视实用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培养。老百姓中识字的人很少。即使在贵族阶层，目不识丁者亦大有人在。当时的俄国，没有世俗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面对如此情境，深谋远虑的彼得大帝认识到，不发展文化教育，不培养有文化、有知识的新型人才，俄国就奢谈摆脱愚昧落后的状态，更不能改变俄国在经济与科学技术等领域依附于西方国家的状况。

<sup>①</sup>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67页。

<sup>②</sup> 同上，第71页。

<sup>③</sup>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235页。

<sup>④</sup> 同上，第236页。

<sup>⑤</sup>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6页。

彼得大帝为培养新型人才,发展教育事业,他把文化教育大权从教会手中夺过来,使其为世俗政权所掌握。创办了各式新型学校,“1701年1月10日,他下令建立炮兵学校,1707年,在莫斯科建立医学专科学校。1712年,在莫斯科建立高等工程技术学校。1716年建立矿业学校”<sup>①</sup>等等。到1725年,“全国共有88所学校。教会学校有46所,国立学校有42所。”<sup>②</sup>从而打破了教会一统教育的局面。

彼得不但牢牢掌握改革的最高领导权,而且善于选拔和使用拥护改革的人才。为了得到大批支持改革并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废除按照出身门第、论资排辈的贵族世袭当官的传统制度,重新制定用人标准。不论出身贫富贵贱,都以知识水平、才能高低、贡献大小三条标准来选拔和任用各级官员。这样就把许多出身贵族的无能之辈逐出了官场,而使大批有才能且支持改革的人,被破格提拔到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岗位上来。

在彼得大帝改革时期,俄国先后建立了一些文化机构,有慈善学校、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科学院等等,这些文化机构的建设与完善,对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通过以上措施,俄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教会对世俗文化的影响,促进了世俗文化教育发展,培养了大批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新型专业人才。使俄国的文化教育得到发展。这种亟需的文化创举,为以后俄国向现代化新型国家的转变创造了尤为重要的条件。

#### (四) 俄罗斯正教会的地位下降

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俄罗斯正教会在俄国精神文化领域处于主宰地位。最高牧首是俄国人们的精神领袖。同时,它拥有雄厚的封建地产,并在领地内享有诸多特权。改革之后,俄罗斯正教会的最高领导权属于沙皇,沙皇罢黜了反对改革、干预皇权的牧首,并废除了牧首制,确立了管理教会的新体制,成立主教公会,并使之受国家官吏管理,这位官吏由沙皇直接挑选。这样一来,“教会就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神职人员变成了沙皇政府的附庸。”<sup>③</sup>

长期以来,俄罗斯正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矛盾的核心是政

陶惠芬:《俄国近代改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52页。

<sup>2</sup>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95页。

<sup>3</sup> 任继愈主编:《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39页。

权和教权谁占统治地位。早在老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期间，牧首尼康就妄图使教权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不过最后以失败告终。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扫除改革阻力，彼得大帝决定进行宗教改革。彼得的改革政策要求充分利用教会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劳动力资源。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彼得大帝取消了牧首的宗教职权，由新成立的世俗机构主教公会组织取代。沙皇成为俄罗斯正教会的“最高首领”，亲临各种宗教典礼和公众仪式。

彼得大帝的教会改革，使俄罗斯正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权，给牧首制以重重的毁灭性一击，从而使教会失去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明确导向。作为彼得改革政策的指导书《宗教章程》的贯彻落实，为彼得大帝消除教会自主权，使沙皇能够广泛地运用教会法律来实施自己的政治。

俄罗斯正教会虽然成为俄国世俗政权的附庸，但仍是沙皇政权统治人民的得力助手。在彼得大帝的教会改革之后，沙皇俄国的上层统治阶级和俄罗斯正教会的上层神职人员融合在一起。为巩固国家政权，沙皇政府让东正教为沙皇的统治带上神圣光环，并令东正教让下层人民顺从上帝的旨意，顺从沙皇的指导思想。在俄国，“‘只有一个上帝和一个沙皇’，‘上帝在天，沙皇在地上’，‘一切是上帝为沙皇的权能’”。<sup>①</sup>同时，“政府还利用俄罗斯正教会推动国家事务”。<sup>②</sup>而东正教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则是甘心服从国家政权，甘作政权的附庸。

彼得大帝教会改革的结果使俄罗斯正教会的地位下降，使其对国家的依附性增强，牧首制的废除，使教会能更好的服务于世俗政权。从此，俄罗斯正教会不再和世俗政府平起平坐，不再享有独占俄国人精神世界的特权，亦不再染指世俗世界的政治领导权。彼得大帝的宗教政策，废除了原来俄罗斯正教会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动摇了俄罗斯正教会的经济独立性。“当然，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俄国社会变得开放了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各样禁止法令的废除，相反，产生了彼得一世时期认为的良好的道德。”<sup>③</sup>

总之，彼得大帝宗教改革之后，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长期争斗已基本结束。至此，俄国世俗权力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未来的发展扫除了一大路障。这

<sup>①</sup>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42页。

<sup>②</sup> [美]马克·拉伊夫著：《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蒋学祯、王端译，新华书店，1996年12月第1版，第46页。

<sup>③</sup> В.Я.Гросул 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XVIII-XIX ве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3, С.76.

一路障的扫除，深深地影响了俄罗斯正教会在以后近 200 年的发展历史。

## 结 论

东正教传入俄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这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它一直与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俄罗斯与东正教——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母亲!”<sup>①</sup>。马克思曾说过:“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的其它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和教会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不叙述教会历史,就无法叙述国家的历史。俄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sup>②</sup>

通过对前彼得大帝时期政教关系的发展历史进行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政权始终争取机会不断地削弱教会势力,突出表现为对教会地产的限制和没收。但教会还是会利用各种条件,保证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前彼得大帝时期,教会势力是俄国加强中央集权的阻力。彼得大帝不甘于俄国的落后局面,实行欧化改革,却受到来自教会势力的阻碍。为确保全面改革的顺利进行,彼得大帝决定对教会进行改革。通过改组宗教管理机构、限制或没收教会财产和打击反对改革的宗教势力等措施,把教会完全纳入在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

纵观彼得大帝时期的政教关系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如下的结论:

1、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是其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利益与宗教利益面前,后者要绝对服从前者,国家政权始终掌握着政教关系变化的主动权。教会则处于被动服从地位,这既体现俄国的政教关系特征,同时也是对这种关系的推动和深化。

2、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也体现出政教关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政教关系的实质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体现在二者分属不同的领域(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领域),统一体现在二者的互补与合作可以达成社会有机体的和谐与秩序。彼得大帝宗教改革之后,俄国政教关系进入一个重新设定的关系当中,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考察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政策,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彼得大帝的改革,深化

<sup>①</sup> 韩全会:《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第56页。

<sup>②</sup>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1-142页。

对俄国政教关系的了解，也有助于提升对理论层面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关系的认识。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1. [苏联]波克罗夫斯基著：《俄国历史概要》[M]，贝璋衡、叶林、葆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 [俄]H. II. 巴甫洛夫—西利万斯基著：《俄国封建主义》[M]，吕和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2月第1版。
3.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4. 陈金田：《浅议沙皇彼得一世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11月第2卷第11期。
5. [俄]德·谢·利哈乔夫著：《解读俄罗斯》[M]，吴晓都、王焕生、季志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6. 杜查理：《彼得大帝》（上、下册）[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7. 段启增：《彼得大帝》[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8. 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9. 戴桂菊：《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J]，《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10. [法]亨利·特鲁瓦亚著：《彼得大帝》[M]，齐宗华、裘荣庆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 韩全会：《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J]，《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
12. 蒋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9期。
13. [苏联]Б. Б. 卡芬加乌兹、H. И. 巴甫连科著：《彼得一世的改革》（上、下册）[M]，郭奇格、陈明、冯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4. 吕大吉、龚学增、何其敏等：《宗教学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15. 刘澎：《国家·宗教·法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6. [苏联]B. B. 马夫罗金著：《彼得大帝传》[M]，余大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2月第1版。
17. [美]马克·拉伊夫著：《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M]，蒋学祯、王端译，北京：新华书店，1996年12月第1版。
18.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9. [苏联]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俄国教会史》[M]，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
20. [苏联]尼·伊·帕普连科著：《彼得大帝传》[M]，斯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75年版。
  21. 潘强恩：《政策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年版。
  22. 邱赤峰：《东正教对俄罗斯政治的作用和影响概述》[J]，《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10期。
  23. 任继愈主编：《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24.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俄国通史简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
  25. [苏联]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主编：《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M]，张开、张曼真、王新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10月第1版。
  26. 孙祥秀：《彼得一世改革》[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27. 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28. 陶惠芬：《俄国近代改革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29.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教程》（第三卷）[M]，左少兴、徐天新、谢有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8月第1版。
  30. 王春永：《俄罗斯政治中的宗教因素》[J]，《今日东欧中亚》，1999年第3期。
  31. 王春永：《浅析东正教对俄罗斯社会的作用和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7期。
  32. 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33. 乐峰：《东正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4. [苏联]约·阿·克雷维列夫著：《宗教史》（上、下卷）[M]，王先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35. 杨翠红：《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36. 张建华：《俄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
  37. 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二、外文文献：

1. А.Н.Мелушевский.Утверждение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M].Москва, 1994.
2. В.Я.Гросул 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XVIII-XIX века [M].Москва, 2003.
3. 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 <http://www.komitet.ru>, 2007-10-15.
4.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IX-X X века[C].Москва,2002.

5. Л.Г.Бзскровный.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и флот в X VIIIвеке [М].Москва, 1958.
6. Н.А.Смирнов.Церковь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IXв-1917г) [М].Москва, 1967.
7. Н.М.Кумиров. Руссия в X VI веке[М].Москва, 1962.
8. George Vernadsky, T. Fisher Ralph, D. Ferguson Alan, etal,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1917*[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后 记

在研究生的生活中，导师张晓华教授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导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诲人不倦的指导作风，都对我个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论文写作的关键阶段，导师给予我理解与宽容，使我的论文写作得以顺利进行，更使我度过了人生中一个殊为艰难的时段。我深知自己的专业功底与理论修养不够。幸运的是，导师的悉心教诲给予我不断前进的动力，使我在逆境中步步向前。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选题到框架，从撰写到修改，事无巨细，导师都耐心点化，为我的论文付出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在论文完稿之际，我要向我的导师张晓华教授致以由衷的感谢和无限的敬意！

感谢和敬意同样献给在论文修改过程中向我提供宝贵资料、为我解决俄语翻译问题的张广翔教授和杨翠红副教授。他们的热情与力助，为我扫却了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在此，我再一次向两位老师表示感谢！

此外，我要感谢中古史研究所里的各位老师，谢谢他们对我的教诲。同时还要感谢文学院的刘建军教授、历史文化学院的王晋新教授、董小川教授、徐家玲教授和世界中古史研究所的王云龙教授，他们都为本论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拓宽了学生的写作思路，使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在此，向各位老师表示真诚的感谢！

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同学们的帮助，他们的意见使我得到了启发，不仅学到了知识，也感受了深深的同窗情谊。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纪国华  
2008年5月